



新政革命與日本

中國1898-1912

任達 (Douglas R. Reynolds) 著

李仲賢 譯

新政革命與日本

中國 1898 - 1912

任 達 (Douglas R. Reynolds) 著

李仲賢 譯

商務印書館

China, 1898-1912: The Xinhai Revolution and Japan by Douglas R. Reynolds
Copyright © 2015 by Douglas R. Reynold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93 by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H.K.)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 1898—1912

作者：任 達 (Douglas R. Reynolds)

譯 者：李仲賢

責任編輯：韓 佳

封面設計：楊愛文

出 版：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匯廣場8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發 行：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印 刷：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榮業街6號海濱工業大廈4樓A

版 次：2015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2015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78 962 07 5639 9

Printed in Hong Kong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繁體中文版序

本書英文原著於 1993 年出版，書名為 *China, 1898—1912: 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①。簡體中文譯本出版於 1998 年，2006 年及 2010 年兩度再版。^②

中國國內 90 年代前後對清末新政的學術研究

在中國歷史學界，80 年代的學術著作中已出現“新政”一詞。但在 90 年代之前，對有關 1900—1911 年間的研究，基本上繼續集中在“革命”這個狹窄的意義上，直接和辛亥革命相連。學者們都知道，在 1956 年孫中山誕辰 90 周年之際，毛澤東發表了《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文中號召人們“紀念偉大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紀念他在中國民主革命準備時期，以鮮明的中國革命民主派立場，同中國改良派作了尖銳的鬥爭。”^③ 清朝最後十年間的改革，無論稱

① Douglas R. Reynolds, *China, 1898-1912: 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3)。

② 任達：《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1912》，李仲賢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第一版；2006 年第二版；2010 年第三版。（編者註：繁體中文版的譯文在簡體版的基礎上做了修訂）。

③ 毛澤東：《紀念孫中山先生》，載《毛澤東選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11~312 頁。

之為“新政”，“變法”或“維新”，因其都只不過是改良派的改革，缺乏革命民主派立場，國內學界多認為不值得認真探討，而不屑一顧。而“革命”一詞只限於“辛亥革命”和與之相關的清朝崩潰，並將其歸於孫中山、黃興等人的個人努力。美國學者周錫瑞 (Joseph W. Esherick) 寫道，毛澤東在 1956 年的發言實際上已經斷言，在整個餘下的毛時代，1911 年革命的歷史核心人物是孫中山及其他革命家，而清廷及其改革者們只起從屬性的，基本上是消極的作用。^④

1949 年後中國對革命的僵硬界定及其狹隘的學術研究，於 1978 年改革開放後逐步得以拓展，在其後十年間，思想獲得解放的學者們得以探討新課題，包括當時清廷在鼓勵和積極推動清末新政中所擔當的角色。90 年代在新政研究方面取得了眾多成果。陳向陽在 1998 年寫道：進入 90 年代，“研究範圍明顯擴大……經濟、教育、法制、傳媒及軍事等新政多方面內容正愈益引起人們廣泛的注意和興趣，其中經濟新政研究尤為引人注目，已成清末新政研究的新熱點。”^⑤ 陳還認為，清末新政研究“出現了多學科研究態勢……社會學、政治學、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軍事學及新文學等多個學科（或從這些學科角度）程度不等地展開了對清末新政的專門化研究，並取得了一批成果”。^⑥

進入 21 世紀以後，對清末新政的研究更為熱烈，成果最為豐

④ Joseph W. Esherick 周錫瑞，“Introduction” in Joseph W. Esherick and C. X. George Wei 魏楚雄，eds., *China: How the Empire Fell*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7。

⑤ 陳向陽：《學術動態：90 年代清末新政研究書評》，載《近代史研究》1998 年第 1 期，第 314 頁。

⑥ 同上註第 314~315 頁。

碩的包括羅福惠、朱英主編的《辛亥革命的百年記憶與詮釋（四卷）》^⑦其中第三卷載有何卓恩等著的《歷史學者對辛亥革命的研究與詮釋》，卷中第三章〈1949年後中國大陸學者辛亥革命研究的進展〉，列有“表3-1 辛亥革命史論文中直接以革命派和清廷為研究對象的論文數量比較”。從表中能看出：80年代，論述革命派的論文佔91%；到90年代，論文減少到佔76%；進入21世紀後，論述革命派的論文數再次降到55%；而論述清廷的卻佔45%。更有意義的是，從2007到2009這三年間，這一比例發生了根本變化，論述清廷的論文佔63%，而論述革命派的僅佔37%。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有關清廷的研究不少是和清末新政有密切且直接關係的。

英文著作

當國內對清末新政研究日益深入時，2003年崔志海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國內外的學者已做了不少的研究。但遺憾的是，在日益國際化的今天，研究清末新政的中外學者之間並沒有進行很好的交流和溝通。”^⑧崔志海的文章是一篇綜合性的評述，從卡梅倫（Meribeth E. Cameron）著名的1931年綜合研究說起，^⑨尤其注重政

⑦ 何卓恩等著：《歷史學者對辛亥革命的研究與詮釋》，載羅福惠、朱英主編：《辛亥革命的百年記憶與詮釋（第三卷）》，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78頁。

⑧ 崔志海：《學術總述：國外清末新政研究專著書評》，載《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249頁。

⑨ Meribeth E. Cameron, *The Reform Movement in China, 1898-191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1)，是英文學術界研究清末維新運動的開創性作品。中文譯著為：（美）卡梅倫：《中國的維新運動，1898-1912》。註⑧第250-257頁，對本書的學術觀點做了很好的概括。

治、教育、軍事、人物（張之洞、袁世凱）、列強相關的英文專著。卡梅倫在其《中國的維新運動，1898—1912》中，引用了慈禧太后1901年1月20日的上諭，上諭稱：“着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國大臣、各省督撫，各就現在情弊，參酌中西政治，舉凡朝章、國政、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制、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併。”^⑩對慈禧這一上諭，卡梅倫稱之為“依照西方路線的現代化政策”^⑪。“現代化政策”這一詞語，正是對清末新政的精確描述。

Xinzheng modernization reforms 得以譯成“清末新政”

在1993年前，在英語學術界，基本上誰也不知道“Xinzheng”（即“新政”的漢語拼音）一詞。^⑫到了上一世紀80年代，開始有人使用“New Policies”（新的政策）來討論新政，但幾乎沒有提及與中文“Xinzheng”一詞的淵源。^⑬“New Policies”這一譯法受到英文世界的廣泛使用。^⑭然而“New Policies”卻是個蹩腳的翻譯，因為它弱化了“清末新政”的豐富內涵。New Policies 這一英語詞語，卻可以用來描述任何政權的“新政策”，包括那些毫無實際意義的一

⑩ 註9第58頁。原始資料見《光緒朝東華錄》，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4601~4602頁。詳見本書附錄I。

⑪ 註9第182頁。

⑫ 見註10。卡梅倫在文中也沒有提到“新政”的中文，事實上，她在過去只使用過“new policies”一次（見第57頁）。

⑬ Mary Backus Rankin,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普遍使用“New Policies”。

⑭ Joseph W. Esherick and C. X. George Wei 魏楚雄，eds., *China: How the Empire Fell*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重複使用 New Policies。

紙公文。而“清末新政”承擔着特殊的歷史背景、作用和意義，並得到了鍥而不捨的貫徹。因為慈禧太后相信，這是使朝廷得以維持清皇朝統治的最後希望。

在 1901—1911 年間的晚清中國，清末新政無論在理念上還是思想上都是大膽的，新政現代化改革的想法和政策也不僅僅是臆測。他們從過去吸取了實際的經驗，特別是從日本明治維新、湖南新政和戊戌變法。^⑮在我的新書 *East Meets East* 之中，我探究了“新政”一詞，在 1900 年之前被賦予的含義及其運用，首先是在明治日本，然後是晚清中國。我在書裏建議“清末新政”一詞的英語表述應為“Xinzheng modernization reforms”（新政現代化改革）。^⑯英語譯法是由漢語“清末新政”直接轉化而來，表達了“清末新政”的範圍、精神和目的，並表明其最後達到的巨大的改革成果。

《新政革命與日本》出版 20 多年來的學術動態

得益於眾多因素的影響，歷史方面的學術研究在這 20 年來不斷進步並日趨成熟。出現了新的一手研究資料，對二手研究資料分析有所精進，新的研究課題不斷湧現，新的分析框架被提出。經常出現新的研究對此前的研究結果進行重新評價，尤其是細節方面，

⑮ 王曉秋、尚小明主編：《戊戌維新與清末新政：晚清改革史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

⑯ Douglas R. Reynolds, *East Meets East: Chinese Discover the Modern World in Japan, 1854—1898—A Window on the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a* (Ann Arbor, MI: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Inc., 2014), 46~49, 408~11, 701. 參見索引 Xinzheng modernization reforms, Xinzheng Reform period, 1901~1911, and Xinzheng Revolution, 第 701 頁。

這一過程還將持續下去。

我的研究《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 1898—1912》中所採用的分析框架至今仍然適用。它從兩個大的維度分析了現代中國的轉變，即新政思想革命以及新政體制革命。在中國學者之中，清末民初史學家桑兵認為這一分析框架尤其有用。2005 年至 2013 年，主持了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項目“近代中國的知識與制度轉型”，主編了一系列專著。他在研究論文中總是開宗明義的指出他關於近代中國轉型的研究是以我書中提到的框架作為基礎。2013 年在項目的最終成果中，他寫道：

不過，作者指出了以下至關重要的事實，即新政前後，中國的知識與制度體系截然兩分。此前為一套系統，大致延續了千餘年；此後為一套系統，經過逐步的變動調整，一直延續至今……

也就是說，中國人百餘年來的精神觀念與行為規範，於此前的幾乎完全兩樣，這一天翻地覆的巨變，不過是百年前形成基本框架，並一直延續到現在。今日中國人並非生活在 3,000 年一以貫之的社會文化之中，而是生活在百年以來知識與制度體系大變動所形成的觀念世界與行為規範的制約之下。任達認為，這樣的變動是以清政府和各級官紳為主導的具有根本性的革命，並且強調在此過程中日本主動與積極影響的一面。對於諸如此類的看法，意見當然難期一律，表達異見十分正常。但任達所陳述的近代知識與制度根本

轉變的事實，却是顯而易見，不宜輕易否定的。^{①⑦}

絕大多數研究清末新政的學者聚焦於最易切入的制度性議題，比如陳向陽在 1998 年的研究中列舉的“經濟、教育、法制、傳媒及軍事等新政多方面內容”。馬勇則在 2012 年的著作中寫道：1901 年 1 月 29 日下詔變法“承認政治體制的變革是一切變革的根本前提。”^{①⑧}

而到了 2008 年，陳向陽本人對於清末新政的理解也已經變得更加複雜與微妙。在他富有洞見的著作《現代中國的興起：從 19 世紀中葉到 20 世紀中葉》中，他認為清末新政只是一個漫長過程的一個階段，這個過程可以追溯到太平天國起義，但與戊戌變法以及義和團運動有着更直接的關係：“儘管維新運動受挫，但深化制度現代化改革的歷史任務既不能繞過，也無法迴避。到 20 世紀初，剛剛鎮壓維新運動的慈禧一放下屠刀，就接過康有為們的旗幟，首先啟動了部門制度的現代化改革。這就是著名的清末新政。”^{①⑨}這本書的關注點大大超出了清末新政制度和經濟維度的局限。在陳向陽的序言、各章及結語中，他反覆強調，在中國當時內憂外患的

①⑦ 桑兵：《總說：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載桑兵等著：《近代中國的知識與制度轉型》，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3 年，第 2~3 頁。而參見相同的桑兵：《總論：近代中國的知識與制度轉型》，載桑兵、趙立彬主編：《轉型中的近代中國（上、下卷）：近代中國的知識與制度轉型學術研討會論文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年，上卷，第 3~4 頁。又參見桑兵：《近代中國的知識與制度轉型：解說》，載桑兵主編：《近代中國的知識與制度轉型叢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 年，第 1~2 頁。

①⑧ 馬勇：《1895—1915 年的中國：大變革時代》，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2 年，第 167 頁。

①⑨ 陳向陽：《現代中國的興起：從 19 世紀中葉到 20 世紀中葉》，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8 年版，第 222 頁。

情況下，現代中國的興起主要表現在六個方面的現代化：技術、經濟、文化、觀念、制度及政治現代化。^{②①}而這一周詳的改革還包括技術、文化和觀念的面向。陳提出的這六個方面事實上需要對中國現代性的思想和體制因素做系統的探究。提到思想，我的新作 *East Meets East* 當中特別對駐日中國外交官、遊歷人員在日記、報告及考察書中借用日語新詞彙的情況進行了考察，這些詞彙日後被廣泛的吸納入中文並對清末思想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這些日語的新詞彙收錄在了英文版的索引之中。^{②②}桑兵當然也對知識與制度體系轉型進行了廣泛與公允的檢視，他的著作分為概念、學科、教育、文化、制度 5 篇，共 19 章。

沈國威的《近代中日詞彙交流研究：漢字新詞彙的創制、容受與共享》是一部研究認真並極具權威的專著。^{②③}他對清末新政期間以及在此之前的中國的思想世界有廣泛的闡釋。日本之於清末中國的思想與體制變動的影響不容忽視。2014 年德國海德堡出版的一本英文著作，將中文字《普通百科新大辭典》放在它的封面。這本書對理解清末新政期間的思想發展也十分有參考價值。^{②④}

②① 同上註第 8~11、197、201~202、320、324 頁。在《序言》(第 1~16 頁)中，陳解釋了他所使用的“現代”的概念，以及他為甚麼使用“現代化”(而不是“近代化”)以及“現代中國”(而不是“近代中國”)。

②② 註 17 參見索引第 643~715 頁。

②③ 沈國威：《近代中日詞彙交流研究：漢字新詞彙的創制、容受與共享》，北京：中華書局，2010。

②④ *Chinese Encyclopaedias of New Global Knowledge (1870–1930): Changing Ways of Thought*, ed. 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and Rudolf G. Wagner (Heidelberg, New York: Springer, 2014)。

需要做出的改變與未來的研究方向

《新政革命與日本》最需要進一步探究的內容如上所述，包括對“清末新政”進行正確的英譯。我在書中將它譯成“New Systems Reforms”（“新體制改革”）。但是“新體制”太過狹義，因為讀者會首先想到制度改革而忽略了技術、概念、學科、教育、文化等其他方面的改革。而最好的翻譯是能夠表達清末新政所涵蓋的範圍，正如上述討論中提到的，並且也是陳向陽所強調，即“Xinzheng modernization reforms”（新政現代化改革）。

至於缺點，中國的學者批評本書中關於中日關係的黃金十年，（1898—1907）的內容。這個提法確實存在問題。無論是中日兩國之間，還是兩國民眾之間在這十年間的關係並非親密無間。比如，在日俄戰爭期間，有日本人殺害中國人的事件發生，並引發其他問題。然而，有材料證明的事實是，眾多有能力的日本人懷着好意，帶着在明治維新期間掌握的現代化的實際經驗，用各自的辦法幫助來到日本的中國人，幫助他們學習日語、法律、進行軍事訓練並且向他們傳授現代商業知識和如何經營銀行。一些善意的日本人還以擔任教習和顧問的名義來到中國，協助培訓中國未來的老師、建立現代化的學校、幫助中國進行法律改革、訓練警察，翻譯包括教科書、百科全書和新聞在內的各種學習材料。這些帶着保全中國的動機，扮演着特殊角色的日本人應該獲得認可，甚至得到紀念。1898至1907年期間並不是中日兩國的蜜月期，然而黃金十年的提法在於讓人們注意到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當時有日本人積極地提供給中國直接且實質性的幫助，助其邁向現代化。

康有為（1858—1927）扮演的角色同樣需要修正，從負面改為正面。我對 1898 年之前的康有為以及他與黃遵憲（1848—1905）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的關係進行了研究。^{②④}黃遵憲於 1896 年在上海創辦了《時務報》，於 1897—1898 年主持湖南新政，並於 1897 年成立了進步的保衛局。黃遵憲的著作《日本國志》（書計十二志，凡四十卷五十餘萬言）出版於 1895 年，為康有為編纂戊戌變法時期呈光緒皇帝的《日本變政考》與《日本新政表》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②⑤}

黃遵憲有 12 年在國外擔任外交官的經歷：1877 至 1882 年在日本；1882 至 1885 年在舊金山；1891 至 1892 年在倫敦以及 1892 至 1895 年在新加坡。而這一職位本身也值得探究。王繼平在他的大作《晚清人才地理分佈研究（1840—1912）》中指出在 1840 至 1912 年間，“駐外使領”為八大精英人才之一。王在書中分別討論了這八大精英人才，分別是：晚清進士、晚清政治領袖、晚清軍事人物、晚清企業家、晚清學術人物、晚清留學生、晚清駐外使領及晚清文化人才。精英人才大部分出身異途而非正途，這些出身異途的人才佔據着清廷認可的各種職位。如果有官員向其他官吏舉薦，吏部允許非正途出身的人是憑捐納、軍功及保舉獲得任命。^{②⑥}當時

②④ 黃升任：《黃遵憲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這是一本值得參考的著作，尤其是《緒論：黃遵憲研究的回顧》，第 1~38 頁以及《黃遵憲政學活動年表》，第 603~637 頁。

②⑤ 康有為：《康有為全集》（12 集），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年版，第 4 集，第 101~294 頁。

②⑥ 王繼平：《晚清人才地理分佈研究（1840—191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年，第 131~138、320~321、563~571 頁。

還存在着大量候補官員。^{②⑦}面對內憂外患，清政府為了王朝的存續不得不採取富有彈性和建設性的政策。

大量異途精英擔任各類“局”的總辦、會辦、提調及委員等高階職位，譬如江南機器製造局（1864年）、福州船政局（1866年）、天津機器製造局（1867年）、南京機器製造局（1869年）、蘭州機器局（1871年）、輪船招商局（1874年）、山東機器局（1875年）、甘肅織布總局（1878年）、電報局（天津，1880年）、開平礦務局（1881年）、上海機器織布局（1892年）等局，再加上在各種同文、船政、武備等學校或學堂、屬於省督撫下的洋務局、各商埠道台衙門的官吏等等。這些精英人才中的很多人獲得了臨時任命，主要是因為正途人員缺乏專門的知識、技能，也不願擔任非官僚臨時性的職位。異途人員由臨時性工作開始，慢慢變成國家追求其自強和富國強兵的政策過程中不可缺少的核心。到了1900年，這些精英人才成了新政現代化改革必不可少的支持者和實施者。自1860年以來，隨着如陳向陽指出的“機器技術、工業經濟、自由文化、理性觀念、法治制度和民主政治的興起”，他們的重要性也逐漸增加。^{②⑧}

後續一個值得探索的研究方向是將上述王繼平、陳向陽和桑兵的方法和洞見整合起來。更好的理解新政前的晚清新精英人才以及他們在塑造中國社會轉變中所擔當的角色，將有助於解釋為甚麼那麼多體制內外的精英會在1901年準備好擁抱革命性的新政現代化

②⑦ 肖宗志：《候補文官群體與晚清政治（1851—1911）》，成都：司傳出版集團巴蜀書社，2007年。書中有關於候補官員情況的討論。

②⑧ 註20第320頁。

改革。這是本書未能探究的議題。

太平天國起義之後，地方上面臨重建。政府之外，在參與社會改造方面有積極作為的紳商在受到破壞的地區起到了領導作用。他們的活動借重了正式政府編制之外的體制外的（extrabureaucratic）精英的力量。當在基層地區出現更多地方參與的情況時，缺乏足夠資源和人才的清廷授權許多有能力的異途出身的人才，將他們延攬到政府的“局”以及公共機構，諸如學校，為中國官員、外商和外交官服務的公共設施等。那些表現出色的人士獲得了官職、特權、晉升以及財富。從上到下，從國家到社會，結合到一起為可以快速改變中國的清末新政的展開鋪路。

在這方面，我想從歷史的角度，做如下闡釋：清廷在高層鼓勵利用體制外的精英進行非常規的治理，默許了那些鄉紳和商人精英組成的積極分子在基層自發利用體制外的精英的做法以合法性。高層的這一容忍和靈活的態度推動了中國現代社會在基層的轉變。中國封閉的官僚體系向更多參與者敞開。這是一個重要的線索，直接關係到清末新政現代化改革的革命性本質。

中國正處於學術研究和出版的黃金時代。我自 1993 年以來的研究非常得益於中國歷史學家深厚的經驗研究著作。幾乎在每一個中國歷史的研究領域，中國學者都已經遙遙領先，而我這樣的海外學者則蒙受恩澤。希望中國的學術界能繼續這一成績並將成果惠及世界。

任達 2014 年 5 月

前 言

如果沒有眾多的機構和個人及時而慷慨的支持，本書的一些概念不可能得以發揮，這本書也不可能寫成。1986年，我獲得全國人文學科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的暑期津貼，又得到亞洲研究會東北亞委員會（Northeast Asia Counci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的資助，得以進入斯坦福大學的胡佛戰爭、革命與和平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for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進行研究，構思了1898—1907年近代中日關係中“黃金十年”的概念。感謝雷蒙·邁耶斯（Ramon Myers）、伊米高·穆菲特（Emiko Moffitt）和馬克芯·道格拉斯（Maxine Douglas），以及胡佛研究所東亞圖書館（Hoover Institutions' East Asian Collection）同仁的幫助，使那年夏天我在胡佛的研究，各方面都非常完滿。

1986—1987年度的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及美國學術學會的本研究聯合委員會（The Joint Committee on Japanese Studies of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and 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的學術研究津貼，使我得以到日本全力研究。東京大學退休教授、現任亞洲大學校長衛藤沈吉出於好意，安排我在東京大學落腳。東京大學社會科學院的石井明教授為我打點一切，使我在不是一年而是兩年裏都感到賓至如歸。能認識東京國立教育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in Tokyo) 的阿部洋教授，我喜出望外，我們在許多研究問題上都有相同的興趣。

我在日本的第二年，1987—1988 年，得到紐約的亨利·魯斯基金會 (Henry Luce Foundation, Inc. of New York) 贊助的“基督教在中國歷史研究計劃 (1985—1991)”的研究津貼，我的研究題目是《日本佛教在中國傳播中的衝突與對抗，1873—1945 年：與基督教相比較》，這一研究深化了我對“黃金十年”的理解，因為 1904—1908 年間，中國對日本佛教佈道團的抗拒達到高峰，並成為普遍性的和外交性的問題。

我在亞特蘭大任教的喬治亞州立大學，對我施惠良多，不但資助我於 1987—1988 年第二次出國研究，而且還在合約中訂定每年有三個月假期的條款，使我每年有整整六個月時間能和妻兒共聚，妻子從 1987 年起始任美國國務院外交官。這一切的安排，歷史系主任格雷·M. 芬克教授 (Gary M. Fink) 起了重要作用。我藉此機會表示衷心感謝。

我長期受惠於已故費正清教授、衛藤沈吉教授、安特魯·里敦教授 (Andrew Nathan) 和史蒂芬·列文教授 (Steven Levine)，多年來，他們不斷寫信支持我的各種研究計劃，其中的一些是本書的基礎。我萬分感謝他們的支持。

在我第一次到日本研究的兩年多時間裏，我的妻子泰凱樂、我的孩子莎拉和安梅給了我很多幫助，他們不僅覺得“在日本過得愉快”，而且每天和我一道分享成就。莎拉和安梅在日本公立學校學習了三年，和同學們結下了很深的友誼，也許她們藉此了解了更多的日本生活。